人物春秋 / 沙舟

南宋常州第一状元蒋重珍

宝章阁直学士蒋重珍

常州素有“中吴要辅、八邑名都”之雅称,人杰地灵、人文荟萃。800年前的1223年,常州无锡县就曾出过南宋第一位状元蒋重珍(1183–1237,字良贵,号实斋)。

蒋重珍家族世居常州已2000余年,历史悠久。《常州府志》卷22记载:“蒋默,字秀芳,阳羡人。弟澄,字少明。父横,仕光武为大将。从军讨赤眉有功,封侯。以司隶羌路潛死。九子皆渡江散处。七寓广陵、二栖阳羡。默(八子)居滆湖之东,澄(九子)居滆湖之西。”

此两支蒋氏徙居湖之滨后,子孙繁盛,人丁兴旺。东汉之后,江南蒋氏多出自毗陵,主要繁衍地区在苏浙皖闽粤等地,成为典型的南方姓氏。其中蒋秀星一支,在晋朝时自宜兴迁徙至浙江台州,成为现代奉化蒋氏的始迁祖。

据《毗陵戚里蒋氏宗谱·一梅堂》记载:该族蒋氏系出北宋观文殿大学士蒋子奇之后。蒋子奇第三子蒋瑎,哲宗元祐三年进士,官兴元知州。其子兴祖官饶州录事,开封府阳武县令,抗金英雄,为国献躯,赠朝散大夫。

蒋兴祖的次子蒋迈,即蒋重珍的祖父,于南宋政和年间由阳羡祖地迁居无锡太湖之滨富安乡蔡村(即今无锡胡埭镇)。蒋迈生子蒋文璧。蒋文璧以私塾教书为生,生两子:长子重玉,次子重珍。

蒋文璧虽家贫,但为了让蒋重珍师从南宋四大家之一、时为吏部尚书的尤袤,特地在雪浪山朱家村购置田地,建造三间草屋,以方便就学。家舍建好不久,蒋文璧不幸因病去世,时重珍十岁。家境贫寒的他只得寄居雪浪庵僧舍度日。母亲顾氏识文断字,对其亲教面授,重珍天资聪慧,过目不忘。年十七时,在私塾为学子讲授“小学”,以资养家糊口。先后在安阳山北筑“文峰书屋”,于雪浪山麓创“重珍书院”。讲学期间蒋重珍仍不懈地跟随尤尚书研读伊洛理学,常沉醉于尤家万卷楼中,直至尤袤逝世。

嘉定十五年(1222),蒋重珍试开封第二,此举使得他对进京赶考信心倍增。蒋重珍酷爱书海,还偏爱竹梅。相传张府堂前有株红梅已经枯死,重珍见状于心不忍,讲学之余以慈悲之心精心维护。一日灵感突然来临,于枯梅前虔诚祈祷:“某若能及第,汝当复生开花。”

或许应了心诚则灵金石为开的吉言,第二年即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初春,此株枯枝竟然绽放出满树红梅。这一年,重珍四十一岁,果然一举夺魁,试礼部第一,殿试癸未科一甲一,为南宋常州府首位状元,应验了“红梅花开兆状元”。

蒋重珍自此自号“一梅”,世称其为“一梅先生”,讲学的坐堂取名“一梅学馆”。此梅树被后人誉称“状元梅”。直至民国年间,雪堰镇一梅堂村坐堂老屋的正厅上方还悬挂着“一梅书屋”的金字匾额。

蒋重珍省试时,魏了翁为省试参详官,乃省试掌复查点检试卷等第的官员,慧眼识珠点中蒋重珍为第一名的考生。《魏了翁年谱》记载:“正月二十五日,为省试参详官,得无锡蒋良贵重珍为第一人。”蒋重珍遂向魏鹤山执弟子之礼,问道于先生,遂成为鹤山学派的一传弟子。

蒋重珍执弟子之礼后,两人亦师亦友,结下深厚感情。蒋重珍母亲顾氏辞世,魏了翁为之撰《顾夫人墓志铭》。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魏了翁被贬谪靖州(今湖南靖州),经过无锡时,蒋重珍毫不避嫌,邀请老师到家中小憩,魏了翁欣然为其作《跋处士蒋南式家传》,称曰:“维其有章矣,是以有庆矣,然则处士之有子也,宜哉!”魏蒋志同道合,立朝不阿权贵,敢于秉心谏言,为人所称道。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行状》云:“向者,近臣惟真德秀、魏了翁,小臣惟蒋重珍、陈埙之,敢与故相议论。”

蒋重珍为官之路,第一份官职是建康军(今南京)签判,该官为闲职,无法满足蒋重珍为国解忧的志向。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母亲顾氏辞世,他以母亲病逝为由回乡服丧守孝。守孝期满后,蒋重珍改任昭庆军(今湖州)签判,郁闷的蒋重珍与部属意见相左,遂再次请求回乡祭母。

绍定二年(1229),蒋重珍奉召入京(杭州)应对,以“本心与外物两者界限”为主题进言,提醒宋理宗警惕要臣专权,不要使朝臣“知有权势,不知有君父,如有他变,何所倚仗?”宋理宗大为感动,授蒋重珍宝章阁直学士(从三品)。

第二年重珍转文阁门。因权贵者忌惮,被差遣镇江府任通判,重珍坚辞不就。辞别时恰逢京城火灾,皇室宗庙都被烧毁,唯独相府完好无损。蒋重珍愤怒上疏,指斥拥立赵昀为帝的宰相史弥远擅权,又进《为君难》六箴——践言、防欺、任贤、去邪、得民心、顺天道,再次提醒宋理宗防止权柄旁落。时史弥远权倾朝堂、生杀予夺的险恶情势下,《为君难》的提出,足见其胆量、识见与风骨。

端平元年(1234),蒋重珍因劳累过度,以病求退。时史弥远已亡,宋理宗亲政,蒋重珍被改以集英殿修撰身份任安吉知州,诏令代理刑部侍郎(正四品),此时已是中了状元的第12个年头了,蒋重珍总算大器晚成。此后又三辞不许,最后以“自劾不能取信朝廷之罪”,获离职退休养病。

蒋重珍告老还乡,为其母亲养病而建的老宅已为他人所占,仅存宅东南角改建的“一梅堂”,遂卖了妻子首饰进行修缮。退隐于此,前植古梅,后修列竹;藜杖野服,日引儿侄从容其间、安心问道讲学,教书育人,广交朋友,琴书自娱,修身养病。其间著有经典之作《一梅堂记》《万竹亭记》,及《乐溪居万卷楼(3首)》《自题云龙小隐》《雷雨夜赋》《题慧山(2首)》《题亭侯祠》《题萧岳英常州朱氏画虫草卷》《登云海亭》等诗文流芳于世。

端平三年(1236)丙申十一月,蒋重珍病逝,享年五十四岁。宋理宗赠蒋重珍为朝请大夫,赐谥号“忠文”。蒋重珍一生不得重用,三次请求辞官不准,最关键的原因是得罪了擅政的宰相史弥远,但留下了为官正直的英名。

蒋重珍生有二子一女,后代在常州亦枝繁叶茂。蒋重珍长子蒋仪,字光周,由无锡富安乡迁居常州市戚墅堰,即为戚里蒋氏之始迁祖。后在戚墅堰西街建有戚里蒋氏祠堂,堂号为“一梅堂”,以纪念父亲功德。至今已近800年,子孙繁衍至30世,先后派散迁移至雕庄上蒋村、下蒋村、武进湖塘蒋家村等地,过着梅竹相伴的清贫田园生活。

常州儿女 / 葛吉霞

从日记看刘国钧的创业创新故事

整理出版《刘国钧日记(外二种)》主要包括刘国钧日记(1945至1949年)、书画收藏笔记和读报笔记,时间跨度从1945年2月至1972年7月。日记鲜活勾勒出一位爱国实业家的人物画像,是研究一代苏商精神的重要文史资料。

刘国钧在美国纺织厂考察时记录道:“细纱大牵伸能纺2寸长花衣,用三根小皮棍,在罗拉中间。钢令用一寸五分或六分管,并达六寸半至七寸。有纸纺纱样,有2寸长花衣,纺二百五十支纱样。”共有14处提到细纱机装置的大牵伸,是刘国钧创办大成一厂初期进行的一项技术革新。日本纱厂利用我国民族纱厂技术低下,大量倾销细纱,冲击民族纱厂,1931年刘国钧洞察到必须进行细纱机的技术革新,把1万余锭的英国道勃生细纱机中普通牵伸改装为“日本式”皮圈大牵伸,同时把双滚筒的单锭传动改为单滚筒的四锭传动,通过装置大牵伸提高转速,使棉纱拉长倍数增加,棉纱支数和质量都有较大提高。为控制细纱车间温湿度、提高棉纱产质量,刘国钧花1万元进口一套空调设备。据《江苏省工业调查统计资料》记载,1937年前,武进“大成厂能纺八支至六十二支纱”,成为民族纱厂的佼佼者。当时上海的民族纱厂也只能纺20支至42支棉纱,其他地区纱厂纺16支粗纱较为普遍。专以生产细纱见长的上海永安纱厂最高也只有60支左右。日记中随处可见刘国钧对于细纱机改进设备的研究,如“跑锭”“帽锭”“环锭”。

正是高支数细纱的生产,使得大成公司在细纱紧缺和技术更新的情况下,能够生产出物美价廉的府绸、哔叽、条子布、斜纹布、贡呢、绒布、元布、细布等种类齐全的产品,畅销国内市场,并远销南洋。刘国钧在1941年5月、8月和1944年3次赴南洋考察,在当地设置经销点。刘国钧描绘了对南洋市场的憧憬:“南洋华侨将近千万,以棉织品往,换南洋土货,回国后转售英美,可左右逢源。”

在日记中,刘国钧直言:“欲发展工业,仍以求己自立为第一。”在实现染织和纺纱产业联合之后,1934年春,刘国钧赴日本考察印花布,购买1台二手八色印花机,并配以1台蒸化机,着手筹建机器印花工场,开启了常州纺织机器印花的历史。大成公司成为国内较早进行机器印花的厂家,最早添置精元染色机,生产洗晒不褪色的元色布。由此,大成纺织染公司实现了纺织染印一体化发展,并使得常州成为国内最早实现民族棉纺织产业自立和自强的地区之一。

1945年的日记中多处提及“华纶”和“华丝斗特”(文中又作华斯斗特、华司斗特),这是刘国钧对毛纺的粗纺(Woolen)和精纺(Worsted)系统的音译。比较毛纺和棉纺的资金投入和产出,刘国钧发现毛纺的盈利能力是棉纺的3倍,从而坚定“另起炉灶,另创一局”,规划扩充纱锭50万枚,形成棉麻毛纺织染印配套的全功能企业,还计划办缝纫厂,自制成衣出售,以解决零头布的出路问题。刘国钧多次建言发展养兔事业,发展毛纺工业和农村副业,1957年将从国外购置的全套毛纺设备捐赠给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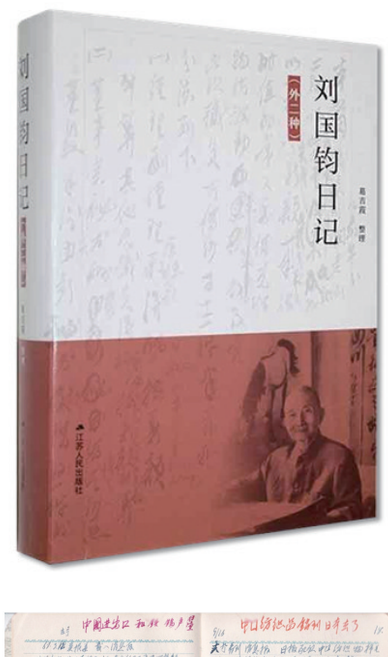
刘国钧只读了不到1年私塾,3年的京货店学徒,创业过程中不断学习近代工厂管理和技术,认识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日记中刘国钧提到“人才”两字共计19处,还有很多对各级人才的布置。其中,1945年8月18日的日记特别强调,“大成要做模范,应该怎样设计、研究,定一个标准,养成领袖人才”。在大成公司创办之初,刘国钧为了推行企业改革,培养青年人才,形成以养成工、艺徒和练习生为主体的工厂学徒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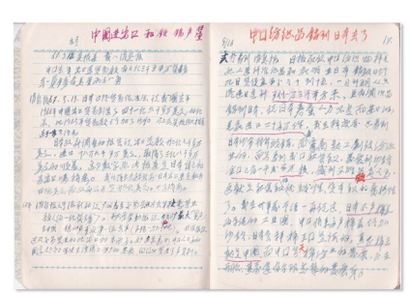
刘国钧洞悉到纺织业具有积累资金快的特点,主张发展重工业和棉纺织业并行。棉纺织业不仅可满足国内衣被消费,而且可出口创汇。刘国钧在日记中直言:“对纺织业必重视,需要扩充南洋出口,获取外汇。”在《扩充纱锭计划刍议》一文中,刘国钧提出以纺织业为桥梁,在现有500万枚基础上,15年发展1000万枚,为工业化提供所需资金,发挥纺织产业的联动作用,并主张利用华侨资金来发展工业。从对企业管理和技术的创新,到对产业的创新,再到对本土工业化道路的实践创新,正是赤诚的爱国之心,形成了刘国钧创新创业的“三部曲”。

刘国钧不仅是一位实业家,也是一位收藏家。书画收藏笔记虽只涉及他的部分书画收藏,但可窥见他对书画的鉴赏能力。谈及收藏历程,刘国钧曾言:“1941年开始在沪买书画,跑展览会,认识钱镜塘,1944年至重庆买画,1948年在香港再买画,1950年由港回沪大买,到后来要购古画,明清不多买了。”1943年秋,刘国钧曾在上海出具银行支票,委托程沧波征集因战乱而散失的常州先贤遗墨。刘国钧收藏古书画精品,既有重金搜求的心仪之作,也有交往密切的画家和社会名流的酬答之作。刘国钧将其书房命名为读画轩,书画收藏的掌眼人主要有钱境塘、陈万里、吴湖帆、谢稚柳等,交流和欣赏书画的好友或是收藏家,或是画家,或是文人,有王南屏、朱光、张炯伯、黄炎培、陈光甫、刘靖基、许厚钰等。

大成公司还有个神奇现象:总经理刘国钧收藏上千幅书画作品,后向南京、常州、扬州、苏州、无锡、广州、靖江、常熟等地八大博物馆捐赠书画;协理刘靖基也收藏有数千幅书画作品;大成一厂厂长华笃安则是金石收藏专家;大成公司常州办事处主任何乃扬也收藏诸多名人墨迹;大成总工程师陆绍云有一定书画造诣,曾参加豫园书画善会、海上书画会,还曾在日本举办画展,担任上海美协首届会员理事,参与筹建上海中国画院。

日记展现了刘国钧丰富的人生履历,从中可以更好地解读刘国钧的创业创新精神。历史学家茅家琦指出,“在刘国钧经验方面应该很值得进一步研究”。





刘国钧捐赠书画 郑板桥《荆棘兰竹石图轴》

左图:刘国钧日记

往事钩沉 / 半部堂

怀念良师许植基

看到常州苏轼研究会群的消息,才得知许植基先生已经仙逝了,很是吃惊。记得去年乘31路公交车时还遇到他的,虽然腿脚有点不方便,但精神很好,两颊红润,眼睛深邃有神。过了几天,再拜读李寿生先生的怀念文章,更觉鼻子发酸,潸然泪下。

许先生196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知识渊博,古文功底深厚,更难得的是他具有钻研精神,对所关心的问题非得刨根问底,弄个究竟不可。因此,在对苏轼的研究上,可谓造诣很深,见解独到。每有文章写出都惊动“苏坛”。

记得2013年,我们一起去黄州参加黄州苏轼研究国际论坛,他的大会交流发言,惊动四座,吸“粉”无数,会后有的约稿,有的要联系方式。多年来,他在《苏轼研究》《放鹤亭》等苏轼研究报刊上发表文章无数,对扩大苏轼的影响、弘扬传统文化、助力伟大的民族文化复兴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许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是严谨的、深刻的,但在生活中他是活泼的、风趣的,是个可爱的小老头。还是那年,在黄州,无论是“赤壁之游”,还是看烟火表演,他都一脸好奇,孩子似的顺着人群往里钻,“抢”到了好位置,还回头招手让我过去。我在人群中寻找着,中等的个子,锃亮的脑门,几根稀疏的头发破土春草似的东张西望,一颗银白的假牙在唇边幽默地微笑着。朴实得像个乡村老大爷,你怎么也和学者联系不起来。

对晚辈,许先生又是真诚的、热情的。一次,常州苏轼研究会年会后,他郑重地对我说:“你文言文基础好,要多做古籍古人的研究,成为某一个方面的研究专家,比如黄仲则研究,做到一提起黄仲则研究就想到你才行。别东一耙子西一棒的,四处开花,成就不高。”现在回想起来,这话是多么中肯呀!人生能遇到几个这样厚德正直真诚的老师!可惜,我现在还没做到,真愧对了他老人家。

十几年前,我爱上了散文创作,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许先生就积极鼓励,在《武进日报》副刊上发表对我鼓励的评论文章,称为“阳湖才子”。没想到,他会这样默默地在背后关注着一个晚辈。于是,我仿佛也有了底气,有了闯劲,心想不论怎样,都有个人在背后撑腰。

可今天,这位撑腰的老人不在了。我一直悲痛着,心里有话但又一时说不出来,不知道怎样说,说得轻了,说得重了,都不合适。也许世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爱和怀念吧。

童年纪事 / 曾泽培

饥饿岁月

小辈们一向和我很亲,相聚时常常会冒出一些很奇怪的问题,我也不介意,总是尽量给他们解答。

有一回,二姐家的孙女问我:“舅爷爷,你饥饿过吗?”

我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想我应该知道什么叫饥饿。在那有口水没油水的年代,往往中午还未开饭,我便嗷嗷待哺似地瞅着饭桌。这时,外婆总是先盛上一碗米饭,那是专门给养家糊口的父亲留的。然后,外婆将自家种的青菜或胡萝卜倒入饭锅,加水煮成一锅咸泡饭,这就是全家人的午饭连晚饭了。

泡饭端上桌,我们哪管得了冷热咸淡,扒到嘴就只顾吞咽。

那时候,我家的早饭经常是煮一锅稀粥,切上点腌制的咸菜,搭上蒸熟的山芋、胡萝卜。难得星期天赶早到米市河阳春面馆旁,围着烘炉排队限量买上三分钱一块的麻糕、五分钱一根的油条,那就算有口福了。

因为饥饿让大家变得贪馋,也变得没有了规矩。一年国庆节,餐桌上摆上了一盘香气诱人的红烧肉,几碟小菜。好长时间没闻到肉香味的我,眼巴巴地盯着。母亲说要等父亲回来才能开饭。“男儿不耐饥,饥火烧其肠。”我实在忍不住了,“唰”地夹了块肉就往嘴里送,自然是换来母亲狠狠的喝叱。

有一回,邻家大男孩站在院子中央大口吃着肉馒头。我见了,堵得慌,心想你馋我。一转身,从家里晃到那男孩面前,坏坏地鼓着嘴,佯装大口大口嚼着。末了,两手还不停地抹着根本不沾油的嘴。似乎想告诉他:我也有得吃。如此聊以自慰,无异画饼充饥。

懂事的二姐总是对我说:“不要老想着吃这吃那的,爸爸赚钱太辛苦了!”二姐每次眯着眼睛说这些话的样子,我到今天还记得很清楚。

诞生在新中国黎明前的《电声》

□李慧 秋冰

1947年6月22日,承载着戚电人希望的刊物——《电声》月刊预刊编辑完成,当年7月1日正式公开发行。这本刊物的“出炉”,标志着戚电人的思想进步跨上了新台阶。

《电声》的出刊,得从1927年11月1日说起。当天,宜兴县农民在中共宜兴县委的领导下,举行秋收起义,打响了江南农民秋收起义的第一枪。

同年11月9日,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兼农民部负责人的王若飞、省委特派员夏霖决定发动4000多农民同时开展秋收起义。中共无锡县委成员孙翔风,利用亲戚关系,找到震华电厂无锡总办事处电力营业部主任、中共地下党员孙梦雷(1922年入党,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艺作家),两人经过秘密商议,决定由孙梦雷发动组织电厂工人制造停电事故支援这次起义。当晚,无锡城区出现两次停电,虽然每次只有几分钟,但全城漆黑一片,打乱了敌人的行动部署,动摇了他们的心理防线。接着,无锡的工人们一边散发传单,一边张贴标语,还在油桶中点燃鞭炮充当枪声,使反动当局感到惊慌失措,成功牵制了城区的部分反动武装。这其间,震华电厂的工人们积极响应无锡乡区秋收起义,其作出的贡献载入了江苏早期工人革命斗争的史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占领了戚电厂,日本人盲目追求电量,滥用设备造成机组故障不断。中共地下党瞄准时机,以维修机组名义进入电厂,带领戚电工人进行抗日,以消极怠工方式,把原本简单的检修工作硬是拖延1年多才修复。

1941年,戚电厂无锡总办事处门口,日本人挂上了“华中水电株式会社无锡支店”的招牌。就在这块招牌对面的一家书店,不时售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以及《时代周刊》等“禁书”,书中的进步思想犹如一团火苗在年轻的营业员尚祖钰心中燃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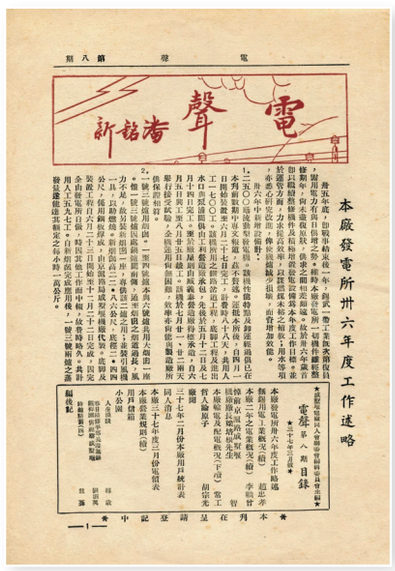
1946年初,从事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地下扩军工作的爱国人士邱宝瑞把尚祖钰介绍给了中共上海外线工作委员会。当年5月,党组织正式批准尚祖钰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嘱咐他,戚墅堰电厂在苏南举足轻重,要利用工作的有利条件,帮助党组织考察发展更多党员。

当时,戚电厂无锡总办事处有一群20岁出头的知识青年,尚祖钰总是有意向他们传播红色革命思想,并将《新民主主义论》等书籍介绍给他们。1946年7月,尚祖钰看到时机成熟,便介绍安荔裳、刘全平、顾冰雁等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胜利后,尚祖珏在上海地下党组织外线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下,与戚电厂电业处公务员兼统计股股长钱佛苏一起发起成立了“戚墅堰发电厂员工同人会”,以此扩大党的影响。同人会成立后,又紧接着成立了同人会联合委员会(简称“联委会”),联委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筹划出一本月刊——《电声》。

《电声》杂志为16开,每期40页左右,编委会自行设计刊头,刊名由扬子公司总经理、进步人士潘铭新题写。刊登的文章有《哲人论原子》等科学技术、戚墅堰电厂发电所概况等工厂报道,还有员工创作的诗歌、幽默小说等作品,每期一刊出,很受大家欢迎,并争相传阅。

没想到,这一举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1947年,尚祖珏的住所周围出现了盯梢的特务。为防万一,中共无锡县委决定:尚祖钰暂停活动,并被安排离开无锡。此时,《电声》杂志出刊了第十一期后,只得无疾而终。



威电发电100年